

诚信危机 道义规范 制度保障

张晓芒

(南开大学 哲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诚信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将是整个社会经济信用的下降和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因此,必须从道义规范的思维必然性出发,强化伦理建设,强化道义规范的信用与权威,以制度保障的形式及信用度,把自律和他律统一起来,把理想的必然,转化为现实的必然。

关键词:诚信;道义规范;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2)04-0373-04

On Integrity Crisis, Moral Norm and System Guarantee

ZHANG Xiao-m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We are unavoidably facing a crisis of integrity when we establish the market economy. As a result, it leads to the decline in the economic credit all over the society, then creates the credit crisis throughout the society. Therefore, from the certainty of the thought of moral norm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intensify the credit and authority of moral norms, integrate self-discipline with external discipline in the form of a system guarantee, and finally turn the certainty of the ideal into the certainty of reality.

Keywords: integrity; moral norm; system guarantee

一、市场经济信用危机引发的思维必然

我们正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市场经济建设,正不可否认地面临着一场信用危机。许多个人、集体,乃至一些地方政府的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及其保护伞,时刻在困扰着善良的人们。据专家评论,信用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稀缺资源^①。问题的严重性于此可见一斑。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经济信用的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信用的整体下降,从而造成一种很难治愈的内伤,人们的心理将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人际之间的正常交易行为时刻充斥着一种本不该有的怀疑。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不是一件好事。

效率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效率是人的活动效率的关键,以至于萨缪尔森认为,对于经济学而言,效率“也许是惟一的中心问题”^②。但是效率的提高,不能囿于自身而孤立地进行,一方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与发展,也即人们是在社会群体中生活着的,社会整体发展的正效应,无疑是每一个人自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生活,既是经济生活,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生活、法制生活,只有在法的精神与道德情操的支撑下,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发展秩序,才能在公平的原则下体现效率,才能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以一种合乎道德、文化精神的利益关系,使之蕴涵着人对自己、对他人、对人类的意义关怀,从而在

收稿日期:2002-07-01.

作者简介:张晓芒(1955—),博士,副教授.

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结合点上,使所有的人通过合理、公正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信用危机急需伦理建设,而伦理建设的前提是急需对自律与他律的理解,这就涉及到道义规范以及对道义规范命题的理解问题。

1. 道义规范逻辑的必要性

荀子曾经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群”。所谓“能群”,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存有一种道义关系,也就是“辨明礼义,人之所长”(《管子·形势解》)。因此,在古人那里,具有道义关系的“礼”被看作是“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成公十三年》)。至今,这一信条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这说明,自古至今,人所存在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道义可能世界,它有着自己的法律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从思维认识的角度看,在道义可能世界中,为了满足对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认识,基本的逻辑规律也必须成立。即,当看到红绿灯时,思维认识要求我们按交通规则行事。自相矛盾的道义可能世界是绝不能成立的。

但是,现实生活却是,许多该做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做,而实际上许多做了的事情却又不允许做的。例如,道德和法律都要求公民遵纪守法,而实际上许多人却在戕害道德,违法犯法;再如,事实上违反道德或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道德或法律却并不允许这样做。这说明,道德理想的应然还远非现实的实然;思维形式的必然,也远非现实的必然。正是因为道义规范的事实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众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道义规范逻辑才有建立的必要性。

道义逻辑就是把存在于人们实际生活中,对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都起着有形或无形的约束作用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政治规范、礼仪规范、纪律规范等,用逻辑方法运行于现实生活领域的结果。因此,它又叫做“义务逻辑”、“规范逻辑”、“伦理逻辑”,它是一种行动逻辑、实践逻辑,它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支配着人们的实践、行动和行为。

2. 道义命题的对当性

道义命题是在一定情况下,给人的如何行动提出某种命令或规定的命题,它以所包含的模态词的不同,分为义务命题、允许命题和禁止命题,以肯定或否定的形式表示之,道义命题有6种:

义务肯定命题表达了根据某种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必须履行或实现的行为或事件状态。其语言表达式为:“必须P”、“应该P”、“一定要P”、“有义务

P”。如,“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为人应该诚信”等。

义务否定命题表达了根据某种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必须不实现的行为或事件状态。其语言表达式为:“必须非P”、“应该非P”、“一定要非P”、“有义务非P”。如,“商业经营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等。

允许肯定命题表达了根据如上规范,可以履行或实施的行为或事件状态。其语言表达式为:“可以P”、“允许P”、“准予P”、“有权P”。如,“允许公民有劳动致富的自由”、“被告有权为自己辩护”等。

允许否定命题表达了根据某种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可以不实施的行为或事件状态。其语言表达式为:“可以非P”、“允许非P”、“准予非P”、“有权非P”。如“允许公民有不受欺诈的自由”等。

禁止肯定命题表达了根据某种道德或法律的规范,禁止实施的行为或事件状态。语言表达式为:“禁止P”、“不得P”、“不准P”、“无权P”等。如“商业经营不得违反国家法律”、“不准假冒伪劣”、“禁止超速”、“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等。

禁止否定命题表达了根据某种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不得不实施的行为或事件状态。其语言表达式为:“禁止非P”、“不得非P”、“不准非P”、“无权非P”等。如,“禁止无证驾驶”等。

由于违反社会公德和法律的行为都被禁止,因此,经常用禁止命题来限制这些行为。

从逻辑上讲,禁止做某件事情,就是必须不做某件事情,也就是不允许做某件事情。而禁止不做某件事情,就是必须做某件事情;也就是不允许不做某件事情。因此,道义命题之间,存在着真假制约关系:

禁止肯定命题(禁止P)等值于义务否定命题(必须非P、应该非P),蕴涵义务肯定命题的负命题(不应该P);等值于允许肯定命题的负命题(不允许P)。如,“禁止践踏草坪”,等值于“应该不践踏草坪”、“不允许践踏草坪”,且蕴涵“不应该践踏草坪”。

禁止否定命题(禁止非P)等值于义务肯定命题(必须P、应该P),蕴涵义务否定命题的负命题(不应该非P);等值于允许否定命题的负命题(不允许非P)。如,“禁止无证驾驶”,等值于“必须有证驾驶”、“不允许无证驾驶”,且蕴涵“不应该无证驾驶”。

这种道义命题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可以借用普通逻辑学中的A、E、I、O之间真假制约关系的逻辑方阵图来表示。

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做;而实际上做了的事情,又有许

多是不允许的。因此,道义命题与人们的实际判断之间并不存在着断定程度大小的关系。道义命题仅仅是一些规范性的命题,它的对当关系,也仅仅说明在道义规范中,各种规范命题之间的思维无矛盾的必然联系。但是,这种思维的必然,是现实道义的必然要求的反映,它在现实生活中,则体现为自律与他律的关系。

自律是对道义规范的一种自觉自愿的遵守,是自我的内在约束;他律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约束。但自律和他律毕竟只是一种人为的道义规范,而任何规范都必须由人来认识、理解、执行。只有当这些道义规范以法的精神和伦理的精神积淀、内化于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内在的道德自觉,并用以指导人们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时,它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信用状。这就好比,有了“红绿灯”的规范,还必须要对“红绿灯”的认识和自觉遵守“红绿灯”的意识,这样才可以在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他律变成自律,由外烁达到内省。如是,就有了一个如何统一自律和他律的问题。其归根到底,又是一个如何保障“红绿灯”的规范,以培养“红绿灯”意识的问题。

二、道义规范的制度保障

道义规范的制度保障涉及理想与现实的问题。

1. 伦理建设

中华民族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礼仪顺遂人情”传统的民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几千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诚信原则,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与作用。

在任何社会,道德的理想境界都是必需的,它在适用于大众内心约束的同时,以一种自觉自愿承担的无限道德责任,使之具有一种“灯塔”的作用。在它的照耀下,无限道德责任由有限道德责任组成,理想境界由现实一点一点地积累。因此,在现实的伦理道德教育中,应该结合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给予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循序渐进的伦理道德教育。比如,可以结合传统的诚信观和传统的义利观,在幼儿园及小学阶段,进行形象化的诚实、守信、自立、爱心的教育;在中学阶段,进行履行公民基本义务教育;在大学阶段,必修伦理课,而在认识、理解各种规范在确定人们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的同时,认识到它们对人生道德理想追求的

意义,使道德理想主义现实化,防范机制有效化。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伦理建设所涉及的是各种道义规范的“为什么”和“怎样做”的价值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它要求以“为事不以诚,则事败”为警戒,自觉培养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的慎独精神,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理想道德境界,在谋求最大效率的经济活动中,不但要追问“为什么”,而且要懂得“怎样做”,在充分理解“义,利也”(《墨子·经上》)的基础上,将取“利”的功能价值与伦理价值结合在一起,从而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保证整个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原则。

2. 道义规范的信用与权威

伦理建设解决的只是思想上的认识问题,还必须把这种认识具体落实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把行动逻辑、实践逻辑的思维必然化为行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要想使道义规范得以实施,必须保证道义规范的严肃性,即道义规范的信用与权威。对此,古人早已有认识。

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道义规范“礼”,其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这种“礼”所调整的范围无所不包,对于个人修养来讲,它是“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成公十三年》);对于治理国家来讲,它是“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国之常也”(《国语·晋语》)。所以,在古人那里,“礼”是防民、治乱的长堤:“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祭统》)

其实,“礼”在更大的意义上,首先是一种自律的行为规范。如果这种自律的严肃性被破坏,就需要他律来制裁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后汉书·陈宠传》)“出礼则入刑”,保证了“礼”的信用与权威。

作为“出礼则入刑”之“法”,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平性,这是对司法公正的期望和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司法自律的标准。这种执法必信、司法必平的公平性,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诚信原则:“法不信,则君行危矣。”(《韩非子·有度》)故而,“法”的这种信用是它的严肃性的前提:“法规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晋书·刑法制》)

于此看来,“礼”、“法”等道义规范的诚信与“礼”、“法”等道义规范的权威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

系,失去诚信的规范将无任何权威,失去权威的规范也将无任何意义。也正是由于“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道义规范的信用和权威才更显得重要:“法行而当,人心乃服。”(明·张居正《张文忠公文集·书牍十二》)然而,事实却是,自古至今,“同责异罚”的“权”和“恤责”的“情”,无时无刻地在破坏着这种道义规范的信用和权威,权大于法和情大于法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果说,有法不依所破坏的是道德自律的承诺,它的后果充其量只局限在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执法不严所破坏的,则是他律的信用与权威了,它的后果将是助长整个社会群体的视规范如虚设,这样的后果才是真正可怕的。

3. 道义规范的制度保障与自律、他律的统一

道义规范的信用与权威需要制度来保障,这是因为,制度是被制定出来保障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求得价值最大化的准则、规范体系^①,它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②。从制度所具有的使行为规范化、有序化以及对任何人都具有的普遍化、一般化、抽象化意义上讲,制度和伦理具有相同性,都是一种规范体系。但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制定出来以约束和调整人们行为的一个准则,还具有强制性;而靠内心的体验、信念和社会舆论来发挥其功能的伦理规范,却不具有强制性。违反道德的却不一定违反法律。人们可以畏惧制度规范,却也可以无视伦理规范。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中,相互交换的经济活动主体,极有可能突破诚实守信这一弱约束形式的道德规范而损害他人的利益。诚信危机的产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要想保证道义规范的信用与权威,必须从制度上真正做到明德信罚,把“礼”的积极规范的教化功能和“法”的消极惩戒的强制效果,并行不悖地结合在一起。在当前面临诚信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礼”、“法”互补的可能性就是,“礼”侧重于预防突破诚实守信这一弱约束形式,即导民向善,使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们,既有理想目标的追求,又有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即所谓“禁于未然之前”;“法”则侧重于惩戒突破诚实守信这一弱约束形式,以禁人为非的“言必行,行必果”的强约束,保证诚信原则的严肃性,继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不受侵害,即所谓“禁于已然之后”。两者的结合就是:“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

在此操作过程中,“法”在提升人的道德观念中的作用与意义是巨大的,只有通过严厉的惩戒作用,强制人们不得不遵守道义规范的思维必然、事实必然,才能使人们相信他律的威严和信用,从而知晓自律的珍贵。他律的威严和信用得到制度保障,自律的培养才有可能。他律的制度保障只是手段,自律的自觉培养才是宏图。

而将这种现实意义体现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急需建立包括个人信用档案在内的社会信用机制,以其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保证的社会化信息体系,在制度保障上以他律保证自律,以自律来维护他律。真正做到从制度保障上使“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管子》)。这样才会使那些恪守自律的人不再感到吃亏,使那些肆意突破他律界限的人也不再感到占了便宜。这样才会在道德的自我约束上,显示明德信罚的信用与威严。当然,在社会信用机制建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诚信的“度”和“法”的“度”的问题。诚信的“度”,应该是社会公认的最低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法”的“度”,则是具体的法律、法规。

总之,理想主义的道义规范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诚信,要通过伦理建设与制度保障的统一来保证,理想主义的自律培养要以现实的他律来严肃地锻造。道义规范的完备与心灵的调节是积淀而成的,只有当那些外在的约束体系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被有效地践行,并逐渐地内化为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自觉意识后,才能真正在人文意义上保证今天的市场经济活动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才能在真正诚信的原则上,建立一种扬弃并熔铸传统诚信观和传统义利观于其中的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才能在现实的“应然”生存方式中,真正使道义规范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由自发转化为自觉,才能真正使道义规范的思维必然发展至现实的必然。但这只是一个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为之付出努力。

注 释:

- ① 徐选礼:“信用,那道无法逾越的门槛”,《检查日报》,2001-08-15。
- ②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 ③ 晏 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 ④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6页,第87页。